



三联·精选阅读文库

读毛泽东札记

陈晋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三联·精选阅读文库

读毛泽东札记

陈晋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毛泽东札记 / 陈晋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9

(三联·精选阅读文库)

ISBN 978-7-108-05539-2

I. ①读… II. ①陈… III. ①毛泽东 (1893 ~ 1976) — 人物研究
IV. ① A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3100 号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康健 薛宇

责任印制 卢岳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7.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毛泽东在中国：存在和意义	1
青年毛泽东的“问题意识”	8
青年毛泽东和青年马克思的“异曲同工”	14
毛泽东早年的思想风景	21
从毛泽东的境遇看中共早期领导层的变化特点	27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	36
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与黄帝陵	47
“韩荆州”在哪里？	55
一封电报的解读	59
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之后	65
“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70
从山水诗人到造反诗人——毛泽东读评谢灵运	77
两晋南北朝知识分子的言行“异相”	83
器识为先——毛泽东谈古代知识分子参政言政	89
“务虚”之用	95
“看得到，抓得起”——毛泽东 1959 年初做的一件事	103
“只唱一出《香山记》”	111
感悟七千人大会的开法	118
行文言事的繁与简	126
干部团队的“和而不同”	130
团队核心人物的凝聚力	137
“出主意，用干部”	143

毛泽东评点党内重要领导干部	150
“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57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164
毛泽东看叶剑英的“大关节”	170
毛泽东·格瓦拉·游击战	177
毛泽东的几个九月九日	187
《毛泽东文艺论集》问答录	196
诗雄不一般	205
毛泽东之读书	209
从北往南看毛泽东	217
领袖故里和领袖文化	221
毛泽东和党史题材纪实作品的虚构问题	227
搏击与新生——读电影剧本《毛泽东，1922》	234
历史旅途中播下的心路风景——序《诗人毛泽东》	238
雪地一片天——序《毛泽东的诗词世界》	240
搜藏出来的学术空间——序《毛泽东诗词版本丛谈》	243
“毛诗”研究的“美学突围”——序《鲲鹏之路》	247
1996年有关毛泽东的书籍随想	252
我看“毛泽东热”	257
邓小平性格及其决策的几个侧影	261
邓小平和他的三个军事“搭档”	267
视察背后的历史含量	271
心有所系，方事有所悟——邓小平读两篇外电引发的思考	275
永远年轻——有感于邓小平的一种精神	280
后记	284

毛泽东在中国：存在和意义

渐行渐远的岁月，把许许多多被称为领袖的人物的荣辱成败，积酿成为或甜或苦的老酒，供人们品评论说。过去的岁月似乎常常按历史的法则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断前进的生活浪潮冲刷着一些领袖人物留在政治沙滩上或浅或深的脚印。于是，领袖人物身后的境遇，也就演绎和印证着一些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后人的评说，同时还彰显着任何外力都难以动摇的历史公平。因为我们不难看到，依然有一些领袖人物的身影，在新世纪曙光的映照下，在大浪淘沙的涌潮中，昂然矗立在人们视野的地平线上。

中国的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袖人物。

领袖的本质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表达者，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守望者，是历史进步的领航者。如果有领袖之位的人，目光所及的仅仅是其自身或小圈子、小集团的利益，而不着意去造福民众，不主动肩负起历史给他的使命，不具有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责任意识

和忧患意识，那么，他暂时的荣耀和拥有的位置，不过是权力所鼓胀起来的一个欲望的皮囊，其生命和权力殆尽之日，也就是皮囊萎缩之时。相反，如果他的一生，能够体现领袖的本质，他就不会被后继的历史之潮湮灭；如果他还有别具一格的风采魅力，他的存在和影响，也会是鲜活生动的。

中国的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袖人物。

从1976年至今，毛泽东逝世已经25年了。在这期间，足足有一整代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离开了人世，同时，也足足有一整代新人伴随着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沐浴着变化多样的生活和价值观氛围成长起来，并且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中坚分子。二十多年间，中国人不知驻足过多少精神驿站，跨越了多么难以想象的历史峰峦。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回望毛泽东，走近毛泽东，体味毛泽东，仿佛有一种依稀相隔的感觉，对许多人来说，“毛泽东”三个字至少已像一部读不完也未必能够全读懂的书。但是，如果超越缭乱障眼的生存枝丫，拨开变乱浮躁的精神氛围，静心贴近我们时代的深处，你不难感受到，毛泽东依然是一个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中华民族现实中的人。他不仅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标记，一种理想期待的象征，一段历史反思的对象存在着，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他还以自己的伟业和贡献，以自己的思想和品格，浸润着中国今天的事业，滋养着人们的心田。

“毛泽东”三个字，蕴含着怎样的历史真谛？他又是怎样穿越时代之门走向今天的呢？

他曾经在湘江的波涛中舒展长臂拥抱“五四”大潮，成为湖南革命的播火者。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把泥腿子们引向开阔的大路上迅跑。在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他走出一条新路，站在遥望东方看得见曙光的山头，点燃了星星之火。在远行的红军将士们濒临绝境的时候，他硬是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急拐了一

个大弯，拨正了航道。在陕北高原的黄土窑洞里，他开始更为艰苦的理论进军，使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群接受了一次特殊的精神洗礼。在牛羊嘶叫的农家小院，他以运筹帷幄的战略智慧，导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战争史剧。在开天辟地的庄严时刻，他和战友们踏着古旧尘封的皇城砖道，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他和战友们领导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振山河，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在战火烧到国门口的时候，他毅然决策，打了一场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抗美援朝战争。在凯歌行进的岁月中，他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经济成为首要任务的年头，他构想和探索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面对东西方的冷战对峙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他始终警觉地关注着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并在迟暮之年开创了崭新的外交格局，使中国走向了整个世界。还是他，率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一贯维护世界和平，主持国际正义，在全球不同肤色的人们中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这就是穿越时代之门，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毛泽东。

生平的简单罗列，似乎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们，毛泽东属于这样一个时代：那是在黑夜沉沉的奋斗岁月里，寻找希望和实现希望的时代；那是在振兴中华的艰难行程中，需要伟人和产生伟人的时代。

完美无瑕的伟人是并不存在的。这样的伟人只能在远离时代主题和社会实践的虚构境界中被塑造出来。真正的伟人总是脚踏实地并沾着时代的泥土杂物来决策领航，总是在伟业受阻于各种迷雾的时候选择和开拓。尽管在后人的视野中，那些泥土杂物或许可以避免，在历史迷雾中选择的岔路也许已一目了然，但今之视古，犹如后之视今。今天的人们多不希望后人苛求于己，自然也就不能苛求前人完全摆脱

时代的束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失误，特别是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让人们扼腕痛心。在社会矛盾的判断上，他夸大阶级斗争，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在一些运动中伤害了不该伤害的社会成员，这些，也让历史顿足遗憾。但伟人之所以是伟人，恰恰在于：他的失误在客观上，总是在历史迷雾中艰难摸索时出现的；在主观上，从来不是为了谋一己之私利，达一己之目的；他的失误在总体上，远远小于他的功绩。

毛泽东最根本的功绩是什么呢？这要从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主题说起。

人们有一个共识：20世纪的中国巨变，先后造就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伟人。在百年巨变的进程中，后者总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正是这前后相承的历史变迁，使中华民族的发展越来越波澜壮阔，使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越来越灿烂夺目，使中国人的奋斗越来越接近激动人心的目标。这就是：摧毁封建专制的牢笼，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完成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摆脱贫穷愚昧的困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概括地说，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寻的焦点，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的主题，表现为两个前后相续不能割裂的内容：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站起来！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富起来！对领航历史的领袖人物来说，这也是两个前后相续不能割裂的伟大使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上承孙中山，轰轰烈烈、天翻地覆地完成了第一个历史使命，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问一些过来人，在新中国成立时的时候，哪一句话在他们的记忆中最为深刻，大概十有八九的人会说，是毛泽东说的那句“中国人民从

此站立起来了！”正是这句话，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历代仁人志士在理想的航道上奋斗不息的历史分量；正是这句话，筑造起历史长河中一座永恒的丰碑。因为这句话所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此有了前所未有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而挑剔的历史在大浪淘沙之后选择毛泽东来宣告这句话，仅凭这一点，他在 20 世纪和 20 世纪以后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所占据的位置，便可想而知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下接邓小平，殚精竭虑地开启了让中国走上文明、富强和民主之路这出辉煌史剧的序幕。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不少重要思想，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即使是他在探索中的失足之处，也成为了后继者重新探索的必然起点，成为了后继者开辟新路的时候不可或缺的重要镜鉴。

继往开来的毛泽东，就这样成为了民族复兴史上浓墨重彩的一个缩影。

事情还远不止此。

毛泽东离去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不会随风飘逝。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还在于，他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奋斗经验和智慧，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气派和民族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中叶，用文字给他们的振聋发聩的思想插上了翅膀，但它飞越千山万水寻找落脚生根的地方，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行程。中国共产党在诞生的时候，手里握的是经过翻译的一个个方块汉字传达的真理。为了让这个真理之花在中国的土地上绚丽绽放，结出果实，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付出何等痛苦的代价，经历何等艰难的寻求，才确认和选择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正是这面旗

帜，以其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宝库，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和广大干部，教育了全国各族人民。正是这面旗帜，从昨天飘扬到今天，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赋予了中国人一种特别的理想和信念，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创新发展的激情和灵感。正是这面旗帜蕴含的实事求是的灵魂，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扬光大，让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一脉相承而又总是与时俱进，于是，邓小平理论横空出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泽被今世。

又一个继往开来！毛泽东思想就这样成为了民族复兴史上的精神血脉。

事情还远不止此。

毛泽东是一个文韬武略、多才多艺的领袖。他是非凡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深邃、见解独到的理论家，胸怀广阔、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决胜千里、指挥若定的军事家，还是一位独领风骚的浪漫主义诗人，博古通今的学问家，别具一格的书法家。正是这些文武兼备的气质，挑战进取的性格，雄才大略的豪情，审时度势的睿智，不拘一格的洒脱，使他在中国革命的一个又一个历史关头，能够把握住时机，迅速决策，挽狂澜于既倒。也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角色品质，使他体现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在从昨天到今天的艰苦漫长的岁月中，毛泽东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个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深邃思想，具有非凡的穿透力。这样的魅力，使毛泽东成为了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使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是那样的鲜活生动。

作为跨越时空的历史沉淀和沧桑巨变的人格化象征，中国人无法淡化毛泽东印迹和影响。如果读懂了他，似乎便读懂了中国的过去，并加深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如果读懂了他，似乎便读懂了这片古老土地上堆积的沧海桑田和在 20 世纪舞台上上演的悲欢离合。

20 世纪不会在宏大的叙事中戛然而止，也不会以平静的方式悄然离去。“毛泽东”三个字，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落下帷幕。在我们为今天的目标倾情奋斗的时候，自然也会在心理空间留下一种独特的感受：滚滚向前的时代不会凭空而来，它总是沿着来的时候辗出的轮辙奔向远方。

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的存在和意义！

青年毛泽东的“问题意识”

1919年9月1日，26岁的毛泽东写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提出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大大小小共144个问题。他把这个《章程》寄给各地朋友，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邓中夏此前曾到湖南发动学生响应北京的“五四”运动，和毛泽东交往甚密。他把这个《章程》拿到10月23日刊印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发表，同时还写了一段说明：“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五四”运动前后，世界是什么样子，中国向何处去，青年人应该做些什么，研究些什么，这些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毛泽东那一代知识分子。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一开头就申明，他提议成立“问题研究会”，就是想弄清楚社会和人生面临的“所必需”或“未得

适当解决”从而影响进步的各种“事”和“理”。这个“问题研究会”虽然没有如愿办起来，但《章程》彰显的“问题意识”，及其列举的认为应该研究和解决的大量“事”和“理”，却记录下青年毛泽东一段值得咀嚼的思考轨迹。

《问题研究会章程》列举的71项144个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以及科学技术诸多方面。有的问题比较宏观抽象，如中央地方集权分权、普通选举、国防军建设、社会主义能否实施、经济自由、教育普及、孔子研究、东西方文明会合等等；有的问题则比较微观具体，如不搞惩罚式教育、私生儿待遇、姑媳同居、工人退职年薪、茶产改良、清丈田亩、退回庚子赔款等等。有的问题比较现实和迫切，如大总统权限、新旧国会、废除各省督军、司法独立、劳工住屋、劳工娱乐、勤工俭学、编纂国语教科书、恋爱自由等等；有的问题则不那么现实，不那么迫切，甚至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造关系不大，如裁军、外债偿还、币制本位、海外贸易经营、海洋自由、爱尔兰独立、重建东部法国，以及飞渡大西洋、太平洋和天山，在白令、英吉利、直布罗陀三个海峡开凿通车隧道等等。

从起草《问题研究会章程》的时间看，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些事和理，明显受到胡适实验主义主张的影响。1918年秋冬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毛泽东便认识了胡适，且多有来往。胡适在7月20日《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毛泽东也如期看到并表示认可。李大钊在8月17日《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反驳胡适的观点，提出：“不错，纸上的空谈的‘主义’是危险的，但主义本身并不带来危险！”这个观点，想必毛泽东也看到了。但他并没有介入这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论争双方都是毛泽东当

时敬重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对这场论争的实质，他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了解。那时候，他正如海绵一样吸收和消化着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无论是对胡适提倡研究的问题，还是对李大钊坚持和捍卫的主义，他似乎都愿意一试。

胡适的思想来源于其导师、美国哲学家杜威。毛泽东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还把杜威提倡的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毛泽东深受明清实学“至诚实用”、“经世致用”观点的影响，这也是他与胡适宣传的“多研究些问题”产生共鸣的一个原因。他当时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在船山学社办自修大学，以及主张先把中国的问题研究透了再出国留学等，也都征求过胡适的意见或受到胡适观点的影响。其中自修大学这个校名，还是胡适帮助他起的。

青年毛泽东的行事作风，也以重实干闻名。他当时参加了著名的少年中国会。参与主持这个团体的李璜曾回忆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周必与毛会晤，会见十余次之后，深深了解到，以毛之性格而论，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实行家。……（王）光祈主持‘少中’，即提出‘工读互助’的一题，来要大家讨论。我们在愚生家聚餐时曾讨论两三次（细节问题），议论甚多。到了第三次，毛泽东便不耐烦了！他忽然发言，说，‘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你们诸位就把换洗衣服拿出来交与我去洗，一个铜子一件，无论大件小件，一样价钱，三天后交货拿钱。’后来他果真就这样做了”。王光祈也说，毛泽东“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之学主实行”。

可见，提出问题和推动实践去解决问题，在青年毛泽东身上是统一的。这就不难理解，青年毛泽东何以用那么大的热情去参加或组织各种各样的学会社团。据粗略统计，他青年时代主持或参加的学会社团有十几个，诸如：湖南一师学友会（原名技能会）、湖南新民学

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少年中国会、湖南学生联合会、上海工读互助团、自修大学、旅京湖南学会、湖南改造促成会、湘潭教育促成会、平民通讯社、文化书社、读书会、俄罗斯研究会等等。这些社团存在的时间和毛泽东在其中的活动时间虽有长有短，但他都努力借这些平台组织同仁下工夫去研究和解决符合学会社团宗旨的实际问题。

再回到1919年9月1日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毛泽东在列了一大堆问题后，也没有一掷了事。除了寄给朋友参考外，他自己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则继续思考和研究。例如，《章程》中列有国语（白话文）、编纂国语教科书等问题，在9月5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便表示要研究“国语”，认为必须“将国语教科书编成”；还说，“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章程》中有一项关于恋爱自由的问题。恰巧长沙有一个叫赵五贞的女学生，因不满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与蔡和森发起创建新民学会，
图为毛泽东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

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里割颈自杀。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个事件，让刚刚加入新民学会的周南女校学生李思安等去调查，然后自己动笔连续写了九篇文章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对封建婚姻制度、妇女解放作了一番扎扎实实的剖析。《章程》中有民众联合如何进行、模范村建设、社会教育等问题。这年12月1日，毛泽东便起草了一个新村建设计划，以推行“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连成一体的理想，甚至到岳麓山一带做过选址的准备。《章程》中列有地方自治、联邦制应否实行、废除督军及湖南如何改造等问题。1920年初，毛泽东便起草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发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呼吁湘人自治，还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以推动联省自治。《章程》中列有派留学生、东西方文明会合等问题。在1920年初的许多通信中，毛泽东反复同人讨论该不该出国留学、何时出国留学，特别是东西方文明的关系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暂不出国留学，先研究中国这块地盘里的事情，然后出去“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总之，青年毛泽东的脑子里，似乎装着太多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但凡碰到了，有兴趣，或觉得有必要，他都要去讨论，甚至去实践一番。

是不是就此可以认定，毛泽东当时只埋头思考解决琐细和实际的问题，而不太探讨宏观上的理论是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说一件轶事。前面提到的黎锦熙，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交往甚密的老师。据黎的日记记载，1915年4月到8月，毛泽东拜访黎20次。黎当时常请三位青年学生帮助抄写报刊稿件，付给一定的报酬。一个是不问文稿内容，什么都抄；一个是觉得文稿中有问题，总是提出来，并代为润色；一个是看到文稿内容与自己的观点不合，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个学生的不同态度，使他们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一位默默无闻；第二位是后来的著名戏剧家田汉；第三位就是毛泽东。